

•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 •

“分权计划经济”时期的普通教育发展： 经济史的再考察

时 磊¹ 杨德才²

(1 扬州大学 商学院, 江苏扬州 225127; 2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南京 210093)

摘 要: 1956 – 1978 年中国普通教育发展异常迅速这一现象与现有文献既有结论存在相当的不同, 通过检验发现, 人口结构变迁和教育机构扩展等供给方面备选解释不能够成为这次教育异乎寻常发展的原因, 需求视角的解释应该引起关注。通过一个需求视角理论模型推演发现, 中国计划经济存在的两个独特性特征: 分权和平均主义, 可以从教育需求层面上强化居民家庭教育投资激励, 进而推动中国普通教育的迅速发展。理论推演基础上使用统计资料、地方志和企业志等经济史材料进行的类实证检验, 以“分权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官员数量、地方政府投资与企业招工、平均主义思潮为脉络, 进一步验证了理论演绎过程逻辑链条的重要环节。结果证实, 是中国计划经济的独特性特征引发了这一时期的普通教育扩展, 这一结论对计划经济研究和普通教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分权计划经济”; 平均主义; 普通教育发展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90159)

一、引 言

2009 年 9 月 28 日, 李玲教授在《第一财经日报》撰文称, “中国经济奇迹”的一部分答案, 可能还要到前 30 年留下的遗产里去找, 这些遗产中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新中国前 30 年奠定的人力资本基础。新中国教育发展数据显示, 1956 – 1978 年中国教育经历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普通(中小学)教育扩展, 尤其“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表现相当明显,^①这似乎与现有文献既有结论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如蔡昉、都阳, 2003), 却与李玲的结论不谋而合。中国普通教育发展主要集中在 1956 – 1978 年这一段, 而根据本文的研究, 从 1956 年中共八大开始中国计划经济表现出与苏联计划经济许多迥然不同的特征, 这些中国计划经济的独特特征与中国普通教育的迅速发展是否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根据费正清的观点, “把一个局部的问题研究得切实彻底, 以后举一反三, 对旁的问题就有独具只眼的看法了”。^②我们试图以一斑而窥全豹, 从普通教育发展问题的解读来深入剖析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经济特征。

① 由于篇幅限制, 数据不具表列出,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原始数据均可参阅《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下文与此处同。

② 转引自高王凌(2005)。

第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是,1956-1978年中国普通教育发展真的很迅速么?数据整理发现,1956-1978年中国普通教育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增长是否是教育发展过分落后的“后发优势”导致的?格申克龙(2009)指出,在落后国家中,在其实际的经济活动状态及发展障碍与这种发展本身所固有的高期望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落后的程度越大,其紧张关系就越强,从而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就越大。不可否认,这种由于教育发展落后导致的张力是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但我们发现1966-1978年普通教育的发展速度普遍高于1956-1978年和1971-1978年,这意味着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普遍认为具有重要破坏性的政治运动的中前期存在一次教育发展的加速。教育发展状况改善导致的张力减小并没有有效阻止这一次教育发展加速。更令人意外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1978-1986年,中国普通教育发展的各种指标无一例外都发生了大幅度的下降,这是否意味着1956-1978年中国教育过度发展了?

1956-1978年中国普通教育发展现象的第一个备选解释是,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人口结构变动导致的。我们使用教育发展数据与新生儿数据实施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从统计上无法拒绝新生儿数量的增长是导致小学新生数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但可以拒绝新生儿数量的增长是导致初中和高中新生数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具体过程略。这说明人口结构的变动只能解释小学入学数量的变动但不能解释初中、高中教育的迅速发展,普通教育发展中的重要部分需要寻求新的解释。第二个备选解释是,政府通过分权方式大幅度提高学校的数量(村村办小学,乡乡办高中),学校数量增加导致了就学成本的下降从而引致了这一次异乎寻常的教育扩展。我们使用教育发展数据与学校数量、教职工数据和教师数据实施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从统计上我们可以拒绝教职工数量和教师数量是初中和高中新生数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也无法拒绝初中和高中新生数量变化是学校数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意味着并不是学校的增加导致了普通教育扩展,而是普通教育扩展导致了学校数量的增加。此外,统计上也无法拒绝初中新生数量的变化是高中新生数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高中扩招是初中扩招的一个结果。稳健性检验显示,使用在校生数据、毕业生数据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上述分析使我们必然得出一个结论:某种程度上,中国居民在1956-1978年这一阶段尤其“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对普通教育的需求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加,供给增加是由需求的变动拉动的。竟然是教育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教育扩展,这似乎与我们的直观印象存在较大的不同。一般而言,教育需求是由教育的高回报率导致的,但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教育回报率是十分低下的:Li & Zhang(1998)利用1977年河北一个生产队的资料估算,生产队在分配劳动收入时从不奖励大多数成员的教育;赖德胜(2001)也证实,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工矿企业里教育回报率是十分低下的。甚至到了80年代早期和中后期,研究也发现教育回报率仍然十分低下,Meng & Kidd(1997)估算1981年城镇教育回报率为2.5%,而到1987年估计教育回报率为2.7%。但显然,仅仅将教育回报率高视作教育需求旺盛的原因是不够的,Zhao(1997)指出,教育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使受教育者获得收益,即影响找到工作概率和提高在工作中的收入。

教育回报率较低评估的只是教育在提高人们工作中收入的作用有限,但是如果教育可以在人们获取高工资工作中作用增强,那么教育需求也会显然增加。中国1956-1978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么,而这样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什么样的社会内在演变逻辑导致了这一事件的发生?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文章的结构将作如下安排: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经济史的梳理详细论述中国计划经济的独特性特征,这种独特性特征我们认为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分权化和平均主义分配,而二者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农民革命的“路径依赖”;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首先建立劳动力市

场分割背景下的劳动需求基本模型,然后结合两个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独特性特征,解释二者如何影响中国居民教育需求;第四部分利用统计资料、地方志和其他经济史材料来验证有关普通教育发展与中国计划经济独特性特征关系逻辑演绎的一些中间环节;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计划经济的独特性特征

中国计划经济具有许多与苏联式计划经济相当不同的特征,这已为许多历史学和经济学者所注意。Qian、Roland & Xu(1998)意识到,中国经济较之于苏联和东欧有着更大的地方权力,这使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改革的难度和系统性风险大大降低,它允许类似经济特区的实验,改革进程对信息完全的要求也较低。吴敬琏(1999)批评中国计划经济的行政性分权,充其量只不过使企业由原来的中央机关附属物,变成了地方行政机关附属物,并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也不能改善经济机制。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既与改革的市场化目标南辕北辙,又损害了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政令统一。可以说分权的命令经济是一种最坏的命令经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1992)也认识到,中国从1957年开始试图修正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弊端,进行了类似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尝试。另一个较少引人注意的计划经济特征是平均主义分配,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放弃或部分放弃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一) “分权计划经济”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学习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并试图在苏联帮助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一条重要的国家方针政策,这为文献所强调。但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震动,本身就对苏联经济体制的许多特征感到担心的中国领导人开始反思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麦克法夸尔、费正清(1992)写到,一些人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的僵化表示担心;另外一些人则认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而忽视农业。在某些方面,毛泽东等人,对苏联制度与日俱增的社会官僚化的含意,对它重视与资本主义而不是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更一致的价值观的做法,感到颇为不解。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以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教训为戒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路线的任务。此后的中共八大以《论十大关系》为核心全面反思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缺陷与弊端,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基本思想。

1957年开始,中国政府做了一些减少过度集中的尝试,措施是放松对某些私人市场的控制以及将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机构。1958和1959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的尝试(麦克法夸尔、费正清,1992)。这些尝试虽然经历了1959-1961年的失败,但毛泽东等人并没有认为是这种尝试设想的失败而认为只是实施过程的问题,毛泽东的建国设想被系统总结为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三面红旗”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麦克法夸尔、费正清(1992)认为中国偏离苏联计划经济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方式的根源是“延安模式”,他们将延安模式总结为“经济工作的分散经营和自力更生”。杨小凯(2002)认为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各地自给自足,采用小型、本地生产技术,反对大型、现代、全面规划的技术,反对专家路线,物质刺激。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路的总结应当结合稍后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来分析,麦克法夸尔、费正清(1992)指出,1966年以后所贯彻的政策,就是自50年代以来提出的、并在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并加进了1958-1959年间“大跃进”方式的某些部分的那些政策。

1957 年与“文化大革命”稳定后 1969 年中国计划经济实施了分权化,吴敬琏(1999)称之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分权。显然这种分权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只是第一次分权迅速失败后又做了一些恢复性的调整。1969 年的分权之所以进行的更加彻底是因为清洗了苏联式计划经济赖以维持运转的中央计划机构和官员。1966 年开始的政治风暴,几乎摧毁整个计划经济赖以生存的中央计划机构。麦克法夸尔、费正清(1992)总结(这场政治风暴后)政府机构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据估计,在 316 名最高层经济官员中,可以肯定的是约有 1/3 受到清洗,而仅有 1/4 的人仍在公共场合露面,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们仍在其位。与权力下放相伴随的是财政收入的下放,1967 年中央财政收入为 491.4 亿元,比 1966 年少收入 139.3 亿元,减少幅度为 25%。1968 年财政收入为 361.3 亿元,减少幅度为 13.9%。中央政府对国家机构也进行大撤并,将原有的 90 个部门合并、调整为 27 个,缩减编制 82%(董辅初,1999;赵德馨,1989)。

中国“分权计划经济”产生原因是什么呢?苏联式计划经济试图以计划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从而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问题,但计划经济的有效性基于两个基本假定:一是信息费用为零,二是计划者具有无限理性。但这些理论假设是脆弱的,首先信息搜集和处理异常困难。根据格鲁希科夫计算,为保持经济计划和管理体制,苏联计划部门到 1980 年止,将要雇用全国全部成年人。同时电子计算机实施障碍来自难于设计一种经济模式准确描述经济间关系,而且决策和信息搜集间总存在时间差距(张军,2004)。在不具备理论假设前提下,苏联式计划经济必须采取分权才能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而信息处理效率越低和能力越差的国家需要越多的分权,故中国计划体制的分权必然多于苏联和东欧。同时,如下文将指出,由于农民革命的“路径依赖”导致的政治运动会周期性地对具备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人才进行清理和去除,从而中国经济不得不依赖更多的分权,前文所讲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二) 平均主义分配

马克思(1975)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剥夺小生产实现生产社会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收入差距加大和工人绝对贫困化,社会消费能力跟不上社会化生产的速度,过剩产能以经济危机方式表现出来。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收入均等化有利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缓解和解决。但部分否定甚至完全否定按劳分配,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却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可能与中国革命的性质有一定关系,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遗留会导致“弱势群体”大量进入社会决策机构,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存在不同的精英结构,农民革命促使了中国社会决策结构现代素养不足。这些弱势者不具备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能力和知识素养,只有寄希望于制定限制竞争策略才可以保持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在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均有显著体现,这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历史的重要基础。

这里的“弱势群体”实质上是宽泛的界定,指在自由竞争环境中生存状况会严重恶化,从而排斥至少限制自由竞争的群体。无论是完全的自由竞争,还是按劳分配式的竞争,都必然在“弱势群体”中激起强烈的反对。这些人显然更喜欢废除“八级工资制”,吃饭不要钱,更反对什么生产责任制、反对按劳分配。某种程度上,这个群体的一少部分还对社会的稳定建设有着极大的恐惧,所以提出“造反有理”,造反就是要“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①“弱势群体”主导社会的政策制定,尤其是在“分权计划经济”改革时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波动,经济状况恶化时重新引进竞争性规则和有经济管理人才

^① 转引自吴建国等(1993)。

来恢复和调整,经济形势好转马上又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经济发展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周期性波动被邓宏图、李亚(2005)称之为“体制困局”。深入剖析“体制困局”产生的内在原因,就不难理解中国社会的决策群体构成主导,从而平均主义思潮的泛滥也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革命具有的农民革命性质,导致了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决策机构内部存在着相当一批不具备现代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素养的政策制定者,而不幸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存在着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使命。这种社会结构的“路径依赖”性质导致中国社会陷入了平均主义思潮,这个群体的斗争武器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引致了对体制内部精英分子的排斥,降低了社会信息处理能力和效率。社会经济体系信息处理能力和效率下降,只有进一步的分权和不断分权,客观上也降低了中国社会改革的风险,这可以说无心插柳柳成荫。1956年开始的中国偏离苏联经济发展路线的尝试,由于中国社会决策主体内部结构的博弈,最终中国计划经济呈现出与苏联式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特征。这种特征与本文研究的普通教育发展具有时期上的契合性,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一定的理论逻辑联系?这是下文将要研究的内容。

三、理论模型

(一) 基础模型

Zhao(1997)推导了一个具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教育需求模型,本文将该模型扩展用于讨论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和教育投入机会成本对居民教育需求的影响。模型给定一个贴现率 r ,个人通过选择最优教育水平 s 最大化其终生教育净收入。 $Y(s, H)$ 是收入方程, H 代表个人能力。与Zhao(1997)、韩莉(2000)不同,本文假设教育的收益为增加值(Value Added),同时本文将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显性化。然后,假设受教育的边际机会成本是与受教育年限无关的一个函数 $C(H)$,由Greenwood & Seshadri(2004),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家庭技术落后会导致传统家庭生产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劳动密集型过程。劳动密集型家庭生产中,个人接受教育必然会放弃一些本可用于家庭生产生活活动的时间,机会成本不可忽视。最后,假设个人如果不接受教育,收入函数表现为一个与能力有关的函数 $y(H)$ 。个人最优化教育投资净收益:

$$\max_s E = \int_s^{\infty} e^{-rt} [Y(s, H) - y(H)] dt - \int_0^s e^{-rt} C(H) dt \quad (1)$$

教育迁移效应必然发生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Zhao(1997)研究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本文研究的既包含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又包含计划经济体制中普通生产人员与计划官僚的市场分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官僚(官员)掌握着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权,掌握着劳动者工作岗位与工作性质的分配权,因此可以获得较高收入或从事幸福指数较高的工作。而要获得这些岗位,受良好的教育可能是必备条件之一。计划官僚和普通生产者的区别在大多经济史研究中称之为“干群差别”,武力(1999)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少数干部享有经济特权,脱离群众,贪图享受的官僚主义现象。并认为,一些政策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城乡差别、干群差别,一些经济不平等通过政治地位差别反映出来。对于农村干群关系,黄宗智(2000)通过长三角地区的研究进行了说明,大队领导每年可免除80%的生产劳动,且掌握着经济管理权、集体收入和财产的分配使用权。而且有显著证据证实,当一个大队那样的行政单位干部是众人企望,但大队干部必须有相当的文化水平。

为研究方便,我们只考虑计划官僚与普通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分割的研究类似,将二者结合起来模型复杂性增加但没有更多的启示。由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两个劳动力市

场: 一个劳动力市场即计划官僚市场收入较高, 另一个劳动力市场即普通生产者市场收入较低, 个人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失业。只考虑计划官僚与普通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我们可以将上述模型修改为:

$$\max_s E = \int_s^{\infty} \{ p(s) B(s) + (1 - p(s)) W(s, F) - y(H) \} e^{-rt} dt - \int_0^s e^{-rt} C(H) dt \quad (2)$$

其中, $W(s, F)$ 表示个人在普通生产者市场的收入方程, F 表示个人拥有的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数量。 $p(s)$ 表示个人接受教育后实现从普通生产人员到计划官僚迁移的概率, $B(s)$ 表示个人在计划官僚市场就业的收入方程。这里个人要么在计划官僚市场要么在普通生产者市场就业, 没有失业。出于分析的方便, 我们将迁移概率表述为

$$p(s) = \alpha + \beta s, 0 < p(s) \leq 1, \alpha > 0, \beta > 0 \quad (3)$$

这里用 α 表示迁移的固定障碍。 α 越小, 说明普通生产者市场以外的就业机会越少; βs 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的部分。教育水平 s 提高, 找到计划官僚部门工作的概率增大。因此, α 描述的是整个市场环境对流动限制的松动。 β 描述的是教育对流动的效应, β 越大, 教育水平对找到工作的概率的影响越大。由此, 我们可以通过对 α 和 β 做比较静态分析来讨论政策或制度造成就业机会的变化对教育选择的影响。由 (2)、(3) 式, 可得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如下:

$$(\beta s + \alpha) [r(B - W) - (B_s - W_s)] + \beta(B - W) + [r(W + y - C) - W_s] = 0$$

$$\text{令 } G = (\beta s + \alpha) [r(B - W) - (B_s - W_s)] + \beta(B - W) + [r(W + y - C) - W_s]$$

由二阶条件: $\partial G / \partial s < 0$

我们来做比较静态分析:

$$\partial G / \partial \beta = (1 + rs)(B - W) - s(B_s - W_s) \quad (4)$$

$$\partial G / \partial \alpha = r(B - W) - s(B_s - W_s) \quad (5)$$

$$\partial G / \partial C = -r \quad (6)$$

第一, 由 $ds/d\beta = -(\partial G / \partial \beta) / (\partial G / \partial s)$ 和二阶条件可知, $ds/d\beta$ 的符号取决于式 (4) 的符号。由经济理性可知, 劳动者要迁移, 自然是从收入较低的部门迁移到收入较高的部门, 因此可知: $B - W > 0$ 。由前文文献回顾可知,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制度结构不奖励大多数成员的教育, 无论是在哪一个部门,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B_s - W_s \approx 0$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ds/d\beta > 0$ 。我们将这一结果总结为命题 1: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由于计划官僚部门的收入高于普通生产者部门, 两个部门都不奖励个人的教育, 因此当教育影响迁移概率的程度加大时, 将会促进社会微观主体受教育激励的加强。

第二, 由 $ds/d\alpha = -(\partial G / \partial \alpha) / (\partial G / \partial s)$ 和二阶条件可知, $ds/d\alpha$ 的符号取决于式 (5) 的符号。由前文分析可知在本文研究情况下存在 $B - W > 0$ 和 $B_s - W_s \approx 0$, 故可以得到结论 $ds/d\alpha > 0$, 我们也将这一结果总结为命题 2: 在计划经济情况下, 由于计划官僚部门的收入高于普通生产者部门, 两个部门都不奖励个人的教育, 因此当向官僚部门迁移的机会增多时, 将会促进社会微观主体受教育激励的加强。

第三, 由 $ds/dC = -(\partial G / \partial C) / (\partial G / \partial s)$ 和二阶条件可知, ds/dC 的符号取决于式 (6) 的符号。但显然 $\partial G / \partial C = -r$, 故显而易见可以得到结论 $ds/dC < 0$, 由此得到命题 3: 在计划经济情况下, 当受教育机会成本下降时, 将会促进社会微观主体受教育激励的加强。

上文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计划官僚和普通生产者的市场分割, 城乡分割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框架得出结论。本文理论模型基础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 如果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很容易消失那么结论可能就十分脆弱。显然, 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由外生政府管制导致的, 计

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不存在可以自由转换身份实现普通生产者到计划官僚的转变，也很难实现劳动力的城乡迁移。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劳动力城乡迁移管制的放松显然对教育需求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韩莉 2000)。由于计划经济的城市偏向政策和集中决策，城市部门、官僚部门相对于农村部门、普通生产者部门的收入较高。

(二) “分权计划经济”时期普通教育发展的解释

由基础理论模型，教育对劳动市场间迁移的影响增加、向更优部门迁移机会增加、受教育机会成本下降会导致社会微观主体受教育激励加强。“分权计划经济”时期普通教育发展的原因是否是以上原因导致的，比照这一框架，显然后两个原因是极其重要的。“分权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信息处理权力的下放，丧失了信息处理的规模经济优势。如吴敬琏(1999)所说，底层计划部门可能需要更多的计划官僚(官员)来搜集和处理信息。而且底层官员处理信息的能力和效率一般会低于上层官员，这也可能增加对计划官僚的内在需求，官僚队伍的增加根据基础模型显然就会提供更大的教育需求激励。同时，由于平均主义分配泛滥，让孩子不接受教育而参加工作的收益显然降低了，即使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也可以获得类似份额的收入，在预期成本为社会承担的前提下预期收益有了增长，显然会进一步强化受教育的需求激励。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也可以利用类似方法处理，“分权计划经济”是否也导致了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呢？计划经济分权就是社会经济资源被转移到了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和技术支持力度都不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度较低的工业，这必然引发城市工业就业机会的增长。根据理论模型研究也会刺激教育需求激励。这样，结合中国计划经济的两个特殊性特征，我们可以逻辑一致地解释中国“分权计划经济”时期的普通教育发展，而且这种时期间的一致性，似乎也可以部分支持本文的理论推测。当改革开放来临，开始体制性地移除计划经济主要表现是缓解社会劳动力市场的严厉管制、拆除平均主义分配，这时候教育的迁移功能被劳动力市场管制放松所取代，且受教育机会成本大大增加，迅速而普遍的普通教育下滑则必然出现。总之，理论模型的基础框架可以解释改革开放前后教育发展的几乎整个过程。

四、经济史的证据

上文将基础模型应用到“分权计划经济”时期教育发展的理论演绎过程逻辑链条显得较长，这就可能导致结论的不稳健性。只有进一步证实理论链条中所推测的现象真的发生了，才能够证明理论推测是完整的。我们认为，至少需要证实下面几个事件是否真的在现实中发生了：第一，“分权计划经济”时期底层官员数量确实比权力下放以前有了增加？第二，“分权计划经济”时期随着权力的下放，随地方政府掌握资源的增加，地方政府投资增加了，并且这些投资项目大都是资本密集度更低的企业？第三，“分权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分配的平均主义确实有所加剧么？依据此三个问题为脉络，本文对新中国经济史的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从而对本文的理论研究做进一步的补充，由于材料限制这方面可能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 “分权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官员数量

由于统计年鉴数据较为粗略，很难分离出地方官员数量，我们试图使用替代性指标：国有单位职工人数。我们整理了8个省区1950—1978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的年增加数。结果显示，1957、1969年中央政府放权之后，地方国有单位就业人数都有一个显著的增加，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证实我们的理论推测，分权在缩减中央政府编制的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地方政府国有单位工作人员，而且这些趋势在8个省区表现出一致的趋势。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应该还包括国有企业的

人数 根据前文理论推测,放权也会导致地方国有企业增加工人数量,这里的效应应该与前文是一致的,当然也许这里面二者存在不一致效应会导致结果产生误导。1969年的分权改革不像1957年,1958年之后由于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国有单位工作人员数量也迅速减少,而1969年之后则保持国有单位人员的稳步增长。在制度框架不变前提下,国有单位就业机会增加必然促进教育需求激励增强。

宏观层面的汇总数据是否会存在加总谬误,如果可以找到一些类似微观数据证实这些理论推测可能会更加有趣。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数据来源:贵州省桐梓县县志(1997)提供的数据,全县国家行政干部数量1965年为1138人,而到了1970年为1730人,1971年为2889人,1972年为2911人,1974年为3405人,1976年为3615人。我们没有找到更早的数据,不能对比第一次分权改革的状况,但第二次分权的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微观数据证实,这种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编制扩张并不是仅仅表现在省级层面上,可能在更低级的政府层次上也是如此。而且这种趋势确实证实了,在197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国家工作人员数量急速增长,这与前文的省级层面数据的趋势是一致的。根据本文的理论推测,一旦计划经济开始实施分权,那么进入官僚部门成为官员的机会增加,就会激发教育需求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动力之一。

(二)“分权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投资与企业招工

与前文类似,很难从统计数据中分离出地方政府企业投资具体数据,我们选取的替代性指标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支出,选取的理由是财政收支代表着地方政府资源掌控能力,资源掌握得越多其可能进行的投资就越多,而这一时期的企业投资大多都是由政府来实施的,统计上计入政府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对8个省区的1950-1978年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基本建设支出的绝对指标进行整理,结果也显示,1957、1969年中央政府放权之后,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基本建设支出都有了相当显著的增长。与上文的分析不同,这里的增长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1957年之后持续了3年保持相关指标的增长,而1969年之后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都是增长的。而且在8个省区之间存在着趋势的共振现象,说明本文的理论推测是符合实际的。

地方政府投资增长是否导致就业增长,相比较于中央政府投资的工业就业增长是否有显著的提升?我们使用分权前后单位财政支出或收入创造的城镇就业数量可以得到非常正面的结论。其他经济史资料也从宏观层面证实,这一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业规模有着非常急速的增长,到了1971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达5318万;工资总额突破300亿,达302亿;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达870亿斤。李宗植、张润君(1999)称之为“三个突破”。

与上文类似,我们进一步寻找微观数据来印证本文的理论设想。桐梓县志报告:1965年县财政总支出为486.13万元,到1969年增加到527.76万元,1972年为589.48万元。上缴更高层财政的收入由1965年278.96万元降到了1971年54.21万元,1972年为27.77万元,1973-1976年间最高的是1974年的49.40万元。1973年,桐梓县兴办“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企业240个,其中社办企业33个,队办企业207个,有小煤窑114个,锅厂6个,硫磺厂13个,陶瓷厂6个,纸厂27个,农村水电占72座。遗憾的是,这里没有从业人员的数据。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山东烟台造锁总厂志(1993)报告,该厂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有三招招工,第一次是1958-1959年,招了265人;第二次是1971年招收161人,第三次是1975-1977年招收358人。全部都发生在本文所称的“分权计划经济”时期,“文化大革命”时代占了很大的比重。

(三)“分权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思潮

本文先使用两个宏观指标来近似测度平均主义:国有企业平均工资与集体企业平均工资的

比值 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比值。第一个数据显示 1964 年国有企业平均工资与集体企业平均工资的比值达到最大值 之后大幅下跌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 这一数值的最低点在 1958 年的激进“大跃进”时期。城乡居民收入比缺失值较多 只包含了 1952、1964 和 1978 年三个年份 但很明显也可以显示 在 1964 年和 1978 年城乡收入差距远小于建国初年的 1952 年。根据理论模型部分的研究 平均主义思潮的出现 会导致受教育机会成本降低从而在预期成本下降、预期收益增加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受教育需求的极力增加。但这种宏观数据描述太过粗糙 很显然证据不能让人信服。

使用经济史资料和微观证据来证实的时候 需要稍微交代一下“分权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不同的分配方法：城市是“八级工资制”，农村则是“工分制”。“八级工资制”始自 1956 年工资改革 这次改革建立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间的比例 约为 28:1。各系列间可以互相换算 同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1956 年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即发布指示：行政十级以上全面降薪 降幅“1-5 级为 10% 6-8 级为 6% 9-10 级为 3%。”1959 年中央明令将最高 1-3 级干部工资标准合并 降到 460 元。1960 年下令 17 级以上党员干部降低工资标准 1-3 级再降 12% 4 级降 10% 5 级降 8% 6 级降 6% 7 级降 4% 8 级降 2% 9-17 级降 1%。对 1956 年的工资标准 毛泽东评论“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 悬殊是太大了”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九评”中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 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八级工资制”的微观数据我们获得了来自福建省情数据库的煤炭工业志的数据 数据显示这一套标准从 1959 年 4 月开始执行 省属企业、专区和县属企业分别执行不同的“八级工资制”，但规定省属企业最高级不得超过六级 专区和县属企业最高级不得超过五级。这样井上人员每月最高工资省属企业为 69.98 元（六级） 最低工资收入为 31 元 专区和县属企业最高月工资为 51.3 元（五级） 最低月工资为 27.4 元。1961 年 8 月 新工人开始执行五级工资制 最高月工资和最低月工资分别为 39.5 元（五级）和 24.2 元（一级） 收入差距大大缩小。“文化大革命”时代平均主义进一步加剧 左倾思潮热衷限制微乎其微的个人收入差别（赵德馨 1989）。孙健（1992）发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再提废除“八级工资制”吃饭不要钱 反对生产责任制和按劳分配。毛泽东 1974 年说道 从供给制到工资制未必是一种进步 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 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 但让步的结果 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

“工分制”是“分权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的分配方法。张江华（2004）描述：粮食分配到户方式有两种 一是口粮 按照每家户粮食消费能力确定的粮食定额；另一种是工分粮 按照工分多少来分配的粮食。口粮与工分粮分配比例通常是“人七劳三” 但无论口粮还是工分粮 都在年终决算中的家庭总工分值中抵扣 口粮配给主要根据年龄确定。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后 这一制度成为集体经济时期各地统一的分配制度。它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以生产队内的家户为基本单位分配；全年共进行两次分配 夏收一次 年终再作一次。生产队会计用全年生产队可分配收入除以全年生产队总工分 得出一个壮劳力工作日价值。每个家户全年总收入就是每家总工分乘以该工分值 减去家户在这一年在生产队中的总支出（主要是口粮消费） 即得出该家户在该年净收入（或净负债）。

农村的平均主义程度取决于口粮在所有收入中的比重 虽然口粮收入按照上述原理也应在年终决算的家庭总工分值中扣除 理论上也应属于劳动所得。但在现实实施中 由于存在类似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农村家庭可以去集体借入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 即使年终形成了净负

债也不必急于偿还 这种预算软约束的示范效应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对集体负债(高王凌 2006)。这种状况下,口粮分配就变成了一种不必偿还且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借入的债务,口粮比重的加大必然意味着平均主义的加剧。黄宗智(2000)等研究认为,粮食中有五成是按人头均分的,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比例达到八成以上。人民公社化、集体经济下的农村分配制度,比之于之前的农村家庭经营和以自愿为基础的初级社、互助组和高级社显然是更平均主义的,而且在实施这种制度后平均主义倾向一直不断加剧直到改革开放初期。

综上所述,以“分权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官员数量、地方政府投资与企业招工和平均主义思潮为脉络,利用统计资料数据、地方志与企业志、经济史研究等材料我们试图验证理论演绎过程逻辑链条的一些重要环节。结果证明了,在“分权计划经济”官员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地方政府投资也明显增加这扩展了企业招工,同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在这一时期内平均主义都有所增强。根据理论模型,官员队伍的增加、平均主义分配泛滥,城市工业就业机会的增长都会增加中国居民家庭教育投资的激励,从而家庭对教育需求大幅度增加引发了这一时期的普通教育扩展。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回顾中国经济的增长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一方面印证了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些结论,但更多地“中国经济奇迹”表现出与传统经济理论存在诸多不同,这些不同彰显了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些土壤,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应该成为理论工作者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内容。本文以1956-1978年中国普通教育发展为索引,深入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特征进行研究,发现中国计划经济存在着两个与苏联式计划经济显著不同的特征,而这两个特征导致了普通教育在“分权计划经济”时期的高速发展,这种发展本身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文章首先通过数据整理研究了中国1956-1978年普通教育发展的速度,得出与传统文献有较多不同的结论,中国改革开放前教育发展的速度是十分迅速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得上过度发展了。然后文章检验了两种可能的解释,认为并非人口的增长和教育机构的扩展导致了这次教育发展,而是需求原因导致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一个理论模型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计划经济的两个独特性特征:分权和平均主义,如何从教育需求层面上加强居民家庭教育投资的激励,从而引致“分权计划经济”时期的普通教育发展。由于逻辑链条可能过长,我们接着使用统计资料数据、地方企业志、经济史研究等材料,以“分权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官员数量、地方政府投资与企业招工和平均主义思潮为脉络,验证了理论演绎逻辑链条的一些重要环节。结果证明了,官员队伍的增加、平均主义分配泛滥,城市工业就业机会的增长引发了这一时期的普通教育扩展。

文章得出启示,首先,微观主体教育投资激励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使计划经济时代也如此。其次,促进农民向城市迁移、强化教育影响迁移概率会加快教育发展。最后,降低受教育机会成本,有利于教育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遇到诸多问题,农村学校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如何为社会大量培育符合未来发展要求的合格劳动者成为教育研究者和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要任务。本文研究表明,促进教育教学内容向更符合农村家庭需求的方向转变、提高农村师资队伍素质、减少劳动力市场阻碍,在贫困地区继续加强资本密集型家用电器补贴、发展农贸市场等政策可以从提高教育预期收益、降低受教育机会成本等角度增加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激励。

参考文献:

- 蔡昉、都阳 2003 《“文化大革命”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破坏》，《经济学(季刊)》第4期。
- 邓宏图、李亚 2005 《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的经济史解释：1956-1996——“体制困局”与改革的内生性与过渡性》，《南开经济研究》第3期。
- 董辅初 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高王凌 2005 《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高王凌 2006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格申克龙 2009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韩莉 2000 《非农就业机会和我国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硕士论文，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 黄宗智 2000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北京：中华书局。
- 赖德胜 2001 《教育与收入分配》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宗植、张润君 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 1975 《资本论》(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等 1992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健 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0年代初)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吴建国、陈先奎、刘晓、杨凤城 1993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 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
- 吴敬琏 1999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武力 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杨小凯 2002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http://business.sohu.com/20041022/n222632912.shtml>。
- 张军 2004 《制度、组织与中国经济改革》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赵德馨 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 洛阳：河南人民出版社。
- 张江华 2004 《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对恰亚诺夫假说的验证与补充》，《社会学研究》第6期。
- Greenwood, J. & A. Seshadri, 2004,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765.
- Li, T. & J. Zhang 1998, “Return to Education under Collective and Household Farming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6, pp. 307-335.
- Meng, X. & M. Kidd, 1997, “Labor Market Reform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State Sector during the 1980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5(3), pp. 403-421.
- Qian, Y., R. Roland & C. Xu, 1998, “Why is China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 Perspectives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46), pp. 1058-1094.
- Zhao, Y., 1997, “Labor Migration and Returns to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9(4), pp. 1278-1287.

(责任编辑 江静)